

Thorstein Veblen

学与商的博弈

论美国高等教育

[美] 索尔斯坦·凡勃伦 著 惠圣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G649.712/7742

学与商的博弈

论美国高等教育

[美] 索尔斯坦·凡勃伦 著 惠圣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orstein Vebl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与商的博弈: 论美国高等教育 / (美) 凡勃伦
(Veblen, T.) 著; 惠圣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ISBN 978-7-208-08287-8

I. 学… II. ①凡…②惠… III. 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IV.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354 号

责任编辑 马晓玲
装帧设计 罗 洪



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

[美] 索尔斯坦·凡勃伦 著

惠圣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2,000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287-8/G·1282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再版序言 伊瓦尔·伯格 / 1

前言 / 47

第一章 序言：大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 / 50

第二章 大学董事会 / 87

第三章 大学管理及其政策 / 103

第四章 大学声望和物质设备 / 135

第五章 大学教职员 / 144

第六章 学者的命运 / 158

第七章 职业培训 / 174

第八章 概要与得失汇总比较 / 195

译名对照表 / 241

译后记 / 243

再版序言

如果读者发觉这几页的序言都是对凡勃伦（Veblen）的一些散乱的论述前提的印证——正如大家所知，凡勃伦的这本书及其他书都是基于这些前提的——那么读者将会大为不悦；然而，理解一点这些前提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读者对凡勃伦其他著作的认识。^{*}首先，我将对该书做一些总体性评论；然后，为读者介绍该书的内容概要；最后，我将评论该书几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在本序言的末尾，我的论述将会与凡勃伦达到基本的一致；在最后几段的论述中，因为凡勃伦的某些观点对当今的实际状况来说已无关紧要，故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或许会使该书有几分逊色，然而，些许的不足不会影响这位天才分析家的基本观点。

* 关于凡勃伦思想的哲学基础，要查找最近的研究文献，可参见默里·G. 墨菲（Murray G. Murphey）的“Thorstein Veblen: Instinctive Values and Evolutionary Science”一文，详见默里·G. 墨菲和伊瓦尔·伯格（Ivar Berg）主编的 *Values and Value Theory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Essays in Honor of Elizabeth Flow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2 - 145。——原注，下略

总 评

首先，在早期现代经济学的熏陶下，凡勃伦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学派的创始人。早期的现代经济学被交付给社会学家、经济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这大大促进了更为严密的动态分析，其平衡边际（banks of equation）就是建立在价格理论（price theory）的假设及其应用中的“边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

价格理论和边际主义的基本前提一直是怪诞的，但它所修订的极为流行的格言“一件事情只有在在其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时才值得去做”的概括并没有完全误入歧途。凡勃伦和其他人在抨击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的技术领域里关于价格理论的观点时，其更大的抨击目标在于上述释义格言中所清晰蕴含的价格体系领域；假如他能活到今天，他仍会致力于此。

与价格理论相一致，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可以以维克托·R. 芬奇（Victor R. Fuchs）提出的两个术语——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和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来划分。他用十分自信的令大多数现代人急于阅读的语言文字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足可以说明前者（配置效率），但是任何具体的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不是由经济学确定的……经济学的视角可以有助于分清其影响（例如公共政策），但不能提供最终的答案，这些必然源自我们的价值观念”。*这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个含义：经济学家自己的工作，如物理学家的工作一样，可以完全价值中立，即使如他所说的，当经济学家对那些“权衡”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明显的不幸冲突表现出偏爱时，也仍然是中立的，当然，这要取决于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s）还是“政府供给控制者”（Supplysiders）。另外一个可能的含义就是：经济学家们自己在国会委员会面前的声明、给专门报刊的投稿或者为《商业周刊》和《每周新闻》杂志写专栏时，对关于政策选择的纯粹技术研究成果应当同个人偏好完全分开；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夏娃。

* *How We L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

芬奇教授非常喜欢引用埃德温·查德威克 (Edwin Chadwick) 爵士的名言：“当感伤主义者 (sentimentalist) 和道德主义者都失败的时候，他将召集经济学家来补救，将其作为最后的一根稻草。”*——这句名言经常被引用。在这样的情形中，经济学家大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至少是一个“经济决策者”。总而言之，芬奇教授借用了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的一条结论来概括其所有结论。加里·贝克尔于 1962 年出版的《人力资本理论》在 1991 年未经修订再版，就教育的主题而言，该书同我们现在谈论的凡勃伦的这本书形成鲜明的对比。贝克尔这样告诉我们：“行为最大化、市场平衡和稳定的优先权构成的联合假设及其运用中的完全理性和矢志不移，形成了经济通道的核心。”**

如果凡勃伦仍然活着，当他读到贝克尔的这一观点时，会像文字大师萨姆·戈尔德温 (Sam Goldwyn) 曾经谈起亚伯拉罕·林肯的情形一样，将在他的坟墓里翻转折腾而不能安息。^[1]把贝克尔和凡勃伦做一个比较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贝克尔作为一名新保守经济学理论的传道者，比凡勃伦晚半个多世纪，扮演了必不可少的却又被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抵制的不幸角色，这些属于凡勃伦思潮学派的现代经济学家竟然赞同已经享有知名度的边际主义学派。凡勃伦制度主义的观点有助于给研究经济过程思想的选择性学派定名；约翰·R. 康芒斯 (John R. Commons)^[2]，凡勃伦的同时代人及崇拜者——也对凡勃伦的一系列观点郑重地做了类似的分析。约翰·R. 康芒斯及其同僚们煞费苦心、极为严谨地致力于制度主义传统的分析，就是后来著名的“威斯康星学派”。

对凡勃伦来说，经济学家们所探究的等价交换 (exchanges of quids and quos) 蕴藏在社会历史文化中，经济学家们从中将其分析抽象出来——实际上凡勃伦也是如此。这种文化最初受控于野蛮人，然后是武力征服者，再后是宗教家，最后

[1] 凡勃伦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经济人”行为的“最大化”偏好和“完全理性”的行为能力两方面进行的。他认为，人们的多数行为是非理性的，人们遵从习俗和习惯，而不是力求效用最大化。——译者注，下略

[2] 制度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之一。

* *How We L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2.

** *How We Live*, p. 1.

是世纪之交^[1]的美国商人和他们“金钱价值观”——价格理论。这一理论由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2]于20世纪50年代将其形象地描绘为大众观念的特征。

凡勃伦或许会颇喜欢加尔布雷思的这种真诚的矛盾修饰法^[3]习语,但他更关注的或许是“大企业之首脑”,他通常认为大企业首脑的说教具有智力上的优越(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可是他不像众多市民中普通的一员那样佩服这些商界领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领袖们的说教,凡勃伦自己可能也会这样,甚至会使用同样的反语,被称作睿智的正统派学说。凡勃伦认为价格具体化为:真正的价值加上制作生产物品时损耗的利益以及那些小贩、拉皮条者、掠夺者、推销者和寄生的经纪人们的劳作(这些实际上是无效的“努力”)所产生的额外的“非劳动增值”。

凡勃伦这本书中有这样一章,我们很快将会看到,它以最具声誉的现代经济学主流派别之一——前面提到的贝克尔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所运用的一种完全颠覆性的方式,煞费苦心地详细描述了商界领袖对美国大学的“引导”。贝克尔在其著作的前言中指出,人力资本理论允许“文化利益”与高等教育紧密相连,那么其主要焦点必然基于(更加可测量的)社会和私人的经济利益。但是,凡勃伦认为,高等教育在为一般学院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职业生涯做准备时,由于职业、工作的“金钱利益”取向,会引起高等教育使命的转移,而这种高等教育使命转移的成本是巨大的。

这些成本在“人力资本论者”对人力资本的估算中并没有被关注到,主要是因为,在他们构建的解释教育收益差别的现代模型中,他们的经济价值体系和概念中都没有涉及“研究与发展”。就其本意而言,将高等教育使命转移

[1] 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

[2]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继承了凡勃伦的观点,以凯恩斯主义批判家自居,强调制度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结构的“缺陷”,要求对它进行改革,并提出了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革的设想。

[3] 修辞中的一种,也称逆喻,如:一个天才的庸人。

的成本转换为除金钱以外的成本也是很困难的，转移的使命会遭遇到需求的改变，就像经济学家们所考虑到的市场操作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样。现代经济学家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衡量基于统计数据，而这些统计数据，或者来自有支付能力的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或者来自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这些教育产品的价值是被单独衡量的，尽管价格显示了一切，但它并没有最准确地表明一切。

凡勃伦认为，一个人只有当他远远地超越了供给、需求和价格等范畴，研究了流行的规范、管理观点、社会中的“思维习惯”以及他从哲学—逻辑学家 C. S. 皮尔斯 (C. S. Peirce) 借用的配方设计，才能真正地完全理解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凡勃伦将其称为一种文化的“人力制度”。这些人力制度围绕现金和贷款交易形成无所不包的习惯——凡勃伦反复指向这种金钱关系——我们可以从它们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出与数字相连的金钱价值观，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对测量技术的敏感，我们也可以借助于智慧将其逐条归纳为可以解决的具体的方程式问题。

凡勃伦是个典型的怀疑论者，他可能很喜欢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1] 谈论愤世嫉俗者时的描述：“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这不仅仅针对经济学而言，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现代经济学的姊妹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在他们顽强地追求这些无常的与数字相关的力量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像芬奇所暗示的那样，当他们从那些不能使自己受益的事情中抽身出来时，在凡勃伦看来，经济学家们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伪装愤世嫉俗者的策略。

凡勃伦认为，市场并不是无序的，不是看不见的手的活动，而是几只手的活动^[2]，有时他联想到的商业阶级的许多关键成员的所有拇指。需求与供给曲线转换的交叉点会以有意义的和稍微有启迪作用的方式压缩诸多现象，但是他们也会

[1] 1854—1900，英国诗人，唯美主义者。

[2] 凡勃伦强调“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在他看来，现实的市场不是自由的，而是受权力控制的。所谓的“权力”，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关系在企业中的反映，而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中的“支配能力”。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只要国家不干预经济，经济就会自然发展起来。这一思想统治了资本主义世界150多年。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市场上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一国的经济才能拉动起来。他的这一理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30多年的繁荣。

处理逻辑学家的“个别错误”的谬论。

总之，凡勃伦否认芬奇、查德威克或加里·贝克尔宣称的社会科学家能够达到客观性的结论，仅仅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的努力——尤其他们在问题的选择、对现象的定义和特征的研究，以及在追求过程中运用的方法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借重文化的贡献；这些文化的贡献以一般而言值得注目的不经检查的方式，影响并润色社会科学家的发现。例如，一个有力的佐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将奴隶制问题上升为内战是否是一项有利可图的安排，其后对美国黑人的歧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从“经济术语”上来讲，效率都是极低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经济学家们的目的而言，可能因此被视为是经济交换的特殊案例，而不被视为公众认可的制度安排的组成部分。一部分经济学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发现种族歧视是效率低下的，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分别估算种植园主和顽固的种族主义者时，很难进行统计。几乎难以计数的从事公共和私人民事权利诉讼的律师的薪水和费用同时出现在经济学家们对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计量中，但是并没有出现在他们所进行的种族歧视的成本—收益分析中。例如，仅仅想一下我们的失业问题，即使我们拥有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我们能消除大部分的犯罪现象吗？

非制度性分析的结果，如凡勃伦所见，很简单地否认这样的事实：芬奇及其同事们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论的政策选择类型的构建中，价值观念确实起着一定作用。稍后，在这几页序言中我将详细阐述凡勃伦的观点，原则上与现代经济学家们对高等教育的概念和分析相联系，因为一个重要的——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部分（今天的“基础研究”），是凡勃伦的《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一书的主题。对现代经济学家来说，到目前为止除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之外，在他们的“研究与发展”有关的计划中，基础研究的作用与人力资本变动中学术的作用再一次被隔离开来。凡勃伦认为，后者的变动阻碍了前者，因为大学活动已经本末倒置，学术与科学成为金钱的附庸。

为使本序言成为该书真正的导言，我的计划是，联系从内战结束到凡勃伦的这本书最终在1918年出版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其几个章节的主要观

点述评一下，其实他的初稿早在出版的十几年前就完成了。至于凡勃伦为什么要等十几年，直到一个特殊的大学校长去世后才出版这本犀利的大作，读者自己可以从他的两个序言中去了解缘由，我不在此赘言。我必须说明，崛起的挪威人，像凡勃伦和我一样^[1]，会以相当强的自控能力容忍这样一个人^[2]，尤其是当他受到被卑鄙的动机驱使的他人的指控并忍受着他人的罪恶带来的痛苦时，我们更能容忍他。凡勃伦说，他的意图就是他所苦涩地描述的那个大学校长——被人们作为一种典范而不是作为撒旦——体面地活着，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直到他连同他的“祸根”一同死去。

这篇序言的要点在于把凡勃伦的一些主要观点同当今大学的实际境况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这需要读者们在自己脑海中回想有关境况，或者不时以凡勃伦的眼光来看待当今大学的境况。在社会科学中，对一项社会批评是否为经典工作进行评判时——凡勃伦属于这种最好的批评家，他也属于社会科学这个万神殿中的一员——要看它是否超越了批评家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要看其总的批评逻辑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我们会看到，总的来说，凡勃伦的评判的确也能很好地适用于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此后 70 多年的美国高等教育实践表明，从凡勃伦毁掉了“强人”^[3]这个典范现象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许多方面越变越糟。后来的几代继任者们——大学的校长、主管人及其有关人员——教务长、院长和其他大学后勤人员以及大学全体教职员（凡勃伦尊称他们为博学的统帅和校长）——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基于更多的在凡勃伦的微积分学中所实现的“超出均数的标准偏差的一半”，严厉的同僚们可能喜欢这样评价。

正如大多数读者所知道的那样，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出版了一大批有关高等教育的著作——从芝加哥大学出版这本书开始，在短期内这方面的著作纷纷问

[1] 凡勃伦和伯格皆为挪威移民的后裔。

[2] 本书中提及的凡勃伦所关注的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 W. R. 哈珀。

[3] W. R. 哈珀。

世。这些著作从课程和大学政策方面对高等教育、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进行专门的分析。基金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各式各样的现代事业和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们、联邦政府机构，甚至多位美国总统也已经加入到不计其数的个别私人观察者的行列，他们或赞同或咒骂大学的管理者、研究者和教师们。

他们所论述的话题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学费比率问题、“政策修订”或大学教职员的缺乏问题、“西方文明”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和兄弟会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大学毕业生收入问题、行政人员和学者之间利益的“适当的”均衡问题、招生政策问题、学术智能测验（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的运用问题、财政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的“博士学位泛滥”问题、分类研究、起草延期服役政策和研究成本过高的合法性问题、大学评估实践问题、（著作的）“不出版即死亡”问题、学生“压力”问题、学生暴动问题、大学间的体育竞赛项目问题和财政补助问题，等等。在有关这些话题的辩论中，一系列大作相继问世，有雅克·巴曾（Jacques Barzun）的权威著作《美国大学》（这是一本极为成功的作品）、美国教育方面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的著作、劳伦斯·维齐（Lawrence Veysey）的综合性历史著作《美国大学的诞生》、大卫·赖斯曼（David Reisman）的著作以及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的《大学理想》等等。尽管现代学者们竭力探究的问题或许不会迅速消失，但是这些努力大部分将会很快被人们忘记。也就是说，近期的大部分探究都是针对单个的问题或片面的分析，如瞎子摸象各执一端，而没有涉及当今高等教育的整个层面。

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与凡勃伦同时代的人，他在凡勃伦写完这本书后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领导的芝加哥大学完全屈服于社会潮流；作为大学的校长，他们在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诸多方面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但是，为了具体问题的分析，这些极为流行的影响的典型却在现代文献中被忽视了。这些新生代著者和编者的新著作，更倾向于只对具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大先生”感兴趣，而很少探求并揭示出现代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精髓。

即使他们按照理想的标准去做，他们也不可能做得很好，因为他们通常会将其研究的过程同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隔离起来，他们倾向于在教育系统内部来探究原因和结果，而不是在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系统内进行。

如果这些作者们能够超越大学院校内生活的高墙，他们就可以抓住广博文化中的至少一个要素，并能够强有力地撼动它。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这样批评美国知识分子危机，认为这种“把欧洲大陆的虚无主义高看得望尘莫及，把虚伪的相对主义理想的庸俗化视为一种宽容”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人们的观念中。^{*}当然，那一系列的思想是很有趣的，但他们在因果关系讨论中不能构成有说服力的“独立变量”。然而，凡勃伦的开拓性研究将会幸存下来，因为它对如何探究才算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为前面列举的近期和当前流行的主题所涉及的各种类型的大量特殊案例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解释。

凡勃伦极力主张我们应当追随商业系统的规则，这是一种在金钱价值观支配下，由参与者随着数量日益增长的精练的毕业生[†]的需求构建的“吸引消费者”的机构。大学的管理日益同金钱价值观念相一致，大学把越来越多的空间用于可用的、实用的、也就是市场化的计划和理想中，而很少用于“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的运动中（除了理想的市场地位之外，好奇心实质上也是为拥有商品化的学术成果的学者们极为关注的学术自由），但对学者们而言，“随意的好奇心”的运动才是其内在的价值。针对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被证明了的作为“商业文化的”“思维习惯”具体体现的学术意义和方法，凡勃伦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的途径。这些习惯没有成为艾伦·布鲁姆的分析对象，（布鲁姆的）那种分析只集中在西方思潮的漩涡和逆流方面，而没有基于社会结构和权力等级制度的变化；在这一结构和制度中，成员们已经通过各方面的能力区别来形成一个社会，

* 引自布鲁姆最畅销的书。布鲁姆没有提到凡勃伦，但通过回顾其院士的固执而不是美国制度，布鲁姆展示出了相同的处境。详见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 我应当提醒读者，凡勃伦是在深层意义上正确地使用了“久经世故的 (sophisticated)”这个词，而不是作为认可的术语，故此处用“精练的 (polished)”一词。

继而形成其教育系统。

因此凡勃伦的分析是制度上的，在对独立的好奇的科学家和学者们转移其压力时，最终却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实际上（凡勃伦）对下列现象既非谴责也非批评：大学校长和学生不断失败的同时却保持着可怜的体面、教授对“真正学术”的忽视、校友的骄傲自负、捐赠者的大厦联合体、兄弟会粗鲁堕落的生活方式、大学教职员对胁迫的忍气吞声、“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热心、学者们甘冒成为跨学科的半吊子从而流露出其无知的危险而广泛地推销其自身。

凡勃伦探查、揭露并斥责、讽刺犯有这些罪孽的人，并不是因为其错误方式本身激怒了凡勃伦，而是因为其对学术事业效能的转移使凡勃伦无法忍受。凡勃伦在书中写到金融家的贪婪和大学领导者的伪善，他不仅指责并试图改造他们，而且更加关注如何减少他们的作风对大学的影响。凡勃伦最后或许赞同了欧文·D. 扬（Owen D. Young）下面的话，扬是一个著名的商界领袖，是“一战”后对德国补偿的早期计划（Young Plan）的发起人，也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早期领导人，他曾经这样说，“在现代商业里我们需要担忧的不是走弯路，而是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对凡勃伦来说，他尤其担心高等教育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我所提到的，凡勃伦把“商业”和“工业”区别开来。他对那些制造产品和服务的人（以及有效地领导他们的人）几乎是炽热的敬慕者；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对那些异乎寻常地全身心地只想挣钱的商人则持轻蔑的态度，认为他们给社会提供的东西就社会意义而言毫无价值。在近代历史上，凡勃伦可能将他们中的几个代表者称为“采购和融资收买的统帅”。

资本主义批评家的词典中有一个词叫做“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读者很快就会发现，的确，凡勃伦在对“金融资本”的分析中，通常表现出尖锐的才智。是的，尖锐的。凡勃伦实际上预见了一种经济制度，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初期开始，就出现了丛林眼睛（Boeskeyed）公司、牛奶岛（Milkenized）公司被兼并、产业的萧条、缩水、缩减产量、经常性停产等危机现象，虽然用尽了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信用依然破产。牛市和熊市在穿越华尔街大峡谷时经历周期性转

换，如果不能很好地驯服牛市和熊市，就必须统筹协调，因此几年前就在电视广告中被恰当地描绘出来的美林集团（Merrill-Lynch）、先知显世（Expose of R. J. Nabisco）、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德莱瑟公司（Drexel-Lambert）等及其他几个比较有财力的公司在过去五年中的令人钦佩的状况，与凡勃伦对商业化背景下的制度性质分析完全一致。

凡勃伦被一般用来对今天的金融家的职业活动进行特征描述的语言吸引，如“袭击者”、“防敲诈”、“毒药片”、“绿票讹诈”、“白种骑士”、“个人防卫”等等。的确，凡勃伦指出，将金融家视为军人，这一隐喻的修辞方法作为华尔街返祖现象的强有力的清晰证明，尽管其概括说明带有野蛮人的方式。

事实上，凡勃伦写作该书的时代正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大商业时代”；如某些陈词滥调中所言，他在那个时代思索他预知的一种新文明制度的构建。在路德教教义问答录的指导下，他将该书中序言所应该回答的问题以一条条教义问答的形式展现，“对上帝你应该怀有敬畏之心……”，大企业首脑的观点可能是“你应该宽容学问的传授者，当校长和职业教育家在我和我的竞争者面前摆下一张桌子的时候，你要成为他们的朋友”。

在本序言中我们也注意到，当今的高等教育也曾出现过几次大发展，而本书中的基本理论并没有为此提供重要的空间：

- 迫使大学对初、中等教育的一些罪孽补偿，通过大学里的招生政策和补救措施来为成人受害者服务，他们在受害时本可以接受在城市中心已经办得比较成功的初、中等教育，可惜他们已经浪费掉了这种早期的生命力；至于工商业界对高等教育资助额的显著增长对现代高等教育所起的作用，既不必称赞，也无须责备，它有赖于读者的感觉。在 1990 年，公司财团为教育捐赠了 14 亿美元，其中 2.64 亿美元给了大学以前的教育；给后者的捐献是 1986 年的 2 倍。

-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s）正面抨击“无能的”教授，随后美国副总统阿格纽（Agnew）将悲观的预言者贬称为否定一切的牢骚大王，哥伦比亚大学的调研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瓦格纳·蒂勒（Wagner Thielens）在一项研究中证明，被刺激得突然惊恐的教授们经常成为自我审查

员，他们害怕参议员，害怕大学委员会中参议员的崇拜者们，害怕在诸多的大学校长们官邸及院长办公室里成为参议员恐吓的目标，作为言论自由的作家和演讲者的校长和院长们因为他们头脑中的个人忧虑是如此地容易妥协。工商业界知道其中有一些参议员是很好的支持者，但仅仅是一些；如 J. P. 史蒂文斯 (J. P. Stevens)，一个陆军部长，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他自己的公司里可以休假。

- 在六七十年代，为了全面贯彻声称保护弱势群体的总统 11246 号行政命令，自由民主人士发起的运动，这其中的许多人是大学教师，将重点放在基础方面。这其中的一些团体从那时起开始运用所谓的权力使已经变得冷酷无情的同事间的诽谤更加普遍化；在其他时间，在有关课程内容安排的论战中，这些团体则领导了已经变得相当堕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运动。这其中的一些人还领导了这样的运动：有些白人以现代施恩人自居，将少数民族看作白人的负担，具有这种“新观念”的人也发起了一些运动，这些运动居然得到了某些自由民主人士的竭力资助。商业文化不断渗入到大部分这样的较量中，群体成员根据个人偏好在他们自己的选区内寻找应该遵守的关于雇佣惯例的诸多规则。

- 山姆大叔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了巨额的财政投资，凡勃伦也在不同的背景下对山姆大叔的 50 个零售市场^[1]做了解释；商界出于基础研究、国防和人力资源发展为其带来的利益而支持这些财政支出，因为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都具有生产性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利润。

凡勃伦也清晰地看到了自然科学中有商人们的利益，但是他没有预料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Eisenhower) 总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那部分，该联合体以各种项目的方式将任务分配给大学的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工程师、医学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随着冷战的全面解冻和国防预算的减少，这时的科学家、大学领导人和机会主义商业领导人之间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最终的结果是企业与大学之间许多契约的签订，像凡勃伦一样的批评家们则害怕科学知识的肆意扩散将会产生非常消极的破坏性作用。人们仍然在观望是否有新的社会科技发

[1] 比喻美国 50 个州的教育市场。

明，这种新发明既有助于有效保护私人信息的工业利益，又有助于使研究结果公开发表的学术利益。

凡勃伦的八个范畴

凡勃伦在八个标题下组织起他的思想——这些并非投石器和箭；他评论的每一个实体必将促成现代大学公民日益增大的防御中心群体，也就是说，他们是敏锐的。不过，我猜想现代文理学院，尤其是人本主义者，将更加热心于凡勃伦所描述的特征。尽管文理学院的同事们大部分总是对待自己比对待被证明完全正确的手段和方法更认真，总的来说，与某种正直的自嘲相比，他们更容易嘲笑身边的大学专业学院和职业学院的多数在职教师。

例如，那些在我自己的大学里接受商业和管理训练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导师们，包括文理学院全体教职员，可能会从学生中发现潜在的天生的商人，其中有些可能是最尖刻的批评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把适用于本科生的学位要求降低到仅仅能完成由文理学院提供的课程的那种水平；这样的大学课程被贴上了“模糊的”、“装饰的”、“虚浮的”、“空洞的”标签。其他的商业学院已经在力求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版本（“管理经济学”）讲授，因为“大学的”经济学“太过于理论性”（并且院长的预算如此昂贵），并且学校还要为学生提供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甚至加上如“人类组织行为学”之类的标题。开设这些似乎多余的社会科学课程，在为生产服务的要求下，对形成雇员们的价值观念、规范和动机方面是很有用的，除了几个非常特别的例外，这些课程由不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人来教授。

凡勃伦指出，一些职业教育家以其实利上的荣耀标榜自己对技术进步、有实用价值的发现和“进步的”管理所作的有价值的贡献；今天，其他人在从企业委托人那里赚取咨询费用时，也感受到这些职业教育家的重要性，企业委托人可以打破大学的围墙而经营企业，为其建议者支付可观的薪金。以我的经验看来，年长的职业教育家常常会使其年轻的同事们追求学术的理想主义烟消云散，对他们